1994年北京国际书展书籍选介·“国际巴哈伊出版社”*

滕守尧

一、《科学与宗教》(Anjam Khursheed: *SCIENCE AND RELIGION*, Bahá'í Studies Publications, 1987.)

本书认为,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敌对的,而是和谐互补的,但是,在过去的四百年间,科学和宗教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赢得人心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现存世界的本质?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争论的结果,似乎科学占了上风。因为科学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理论,使宗教的有关教诲黯然失色。多数现代西方人对宗教失去热情,认为宗教充其量是一套过时的价值和信仰,它对原始社会有用,现在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有些人干脆把宗教和迷信混同起来,认为它的存在是世界上无数冲突和争斗的根源。在行为和伦理标准方面,科学同样占尽了上风。因为科学总是谦逊地将它的所有的主张和发现摆在世人面前,任从批评和指正。从不逼迫人们去信仰它,更不需要对它的教导感恩戴德。宗教则恰恰相反,它总是傲慢地宣称自己的教条一贯正确。自己的信仰不需要随时修正。在某些历史时刻,它甚至用折磨和火刑柱来硬性推行这些信仰;它常常固执地坚持种种过时的观点,把人们分割成不同的派别,互相争吵不休。科学具有一种在相互竞争的机制中作出理性选择的方法,所以它平稳地进步着,把不同的民族、国家和传统团结在一起,和谐一致地追求知识。许多思想家谴责说,宗教使用虚假的诺言,声称要给信仰者以永恒的报答,这种许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压迫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统治者使被剥削阶级对其俯首听命,放弃有限的尘世福利。

然而遗憾的是,科学所占的上风终于使它自己也成为现代人迷信的对象。作者指出,在原始的拉丁意义上,“世俗的”(profane)是指庙宇之外的。如今,我们的文明似乎成为科学的庙宇。科学家成了这个新的时代的牧师,而宗教则站在庙宇之外,“神圣”和“世俗”的古老区别整个地颠倒过来了。作者认为,这种将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的倾向是错误的,因为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区别并不总是存在着。在古希腊,思想家们自由地进行宗教的洞察、哲学的思辨和科学的研究,这些不同的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使灵魂得到营养。也就是说,那时的宗教和科学都在庙宇之外的,但二者都是神圣的。只是在基督教时代,宗教才被改造成一种等级森严的权威性结构,人类的探索才被迫专注于神。作者不否认,在宗教与科学和谐相处时代,科学发展比较缓慢,科学只是在经历一个与倒退的宗教和哲学偏见相冲突的阶段后,才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尽管如此,那种认为对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精神战争中一个取得了胜利,一个已经失败的看法仍然是一种严重的偏见。他认为,在17世纪欧洲

*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5年第2期。

思想革命时，科学要取得自己的发展，不得不取消教会所声称的对人类理解和理性的最终发言权。但是，这场冲突，不是处于宗教和科学之间本质上的不和谐与不一致，而是现代科学与黑暗时代的腐朽的宗教教条之间的冲突。同一时期内伊斯兰文明中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反驳了宗教本质上就是与科学和进步冲突的理论。今天，二者的冲突仍然在继续，这完全是出于对科学和宗教的真正目的和性质的误解。这些误解歪曲了我们对它们之间的和谐关系的知觉。

作者认为，现代"科学迷信"已经走到极端，它取消了宗教在人类起源和命运问题上的发言权，自己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例如，19 和 20 世纪兴起的机械进化论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是：进化来自突变，突变来自偶然性的机遇。这种很难被科学方法证实的论调使进化过程变得毫无意义，人类整个地变成了无目的动物，而当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观念进一步侵入社会领域时，整个社会伦理便被摧毁了。幸运的是，科学在 20 世纪的一系列新发现，使进化论的种种论调开始动摇，人们发现，机械决定论已经无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宇宙中发生的事情。当人们深入物质世界的更加秘密的层面时，仿佛从中听到了古老宗教的诱人的回音。这些新的发展提供了使科学和宗教再次和谐相处的可能性。

二、《大同：取得和平的创造性基础》(*Unity-The Creative Foundation of Peace*, by H. B. Danesh, M. D., Bahá'í Studies Publications, 1986.)

本书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如何取得世界和平"，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述，提出了令人鼓舞的观点。它认为，和平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但不幸的是，人类的历史却充满了互相倾轧和争执、互相争斗和战争。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时，几乎都以竞争信条和霸权意识作指导，而很少以普遍的人类之爱、人类平等和男女平等为信条。在现存的各民族历史中处处可见对战斗英雄的崇拜，对民族和国家在竞争中的胜利的描述，对自己击败敌人的能力的自豪，以及对自己的破坏和暴力行为找到的理由和根据。但是，人的终极本性是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虽然各个民族的历史书籍都以战争、胜利和失败为主题，其文学、诗歌、音乐、艺术和精神追求中却充满着对爱、和平和大同的渴望以及对战争和死亡的恐惧和厌恶。目前的现状是，现代世界尽管具有先进的科技，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对如何制止战争和暴力似乎无能为力，对如何争取和平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和措施。按照本书作者的意见，尽管历史和现状如此糟糕，人类和平仍会到来，其逻辑是，和平的前提是大同，大同的前提是人类的成熟，而从幼稚到成熟又是生命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和平是人类的必然归宿。虽说和平是必然归宿，并不意味着和平不需争取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和平的前提是大同，就必须创造大同的条件。大同不仅指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还指每一个人内心的和谐。没有人心的和谐或大同，就没有世界的大同，战争起源于人的内心的混乱，所以有必要首先在人的内心中建造起防止战争的堡垒。只有人的内心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他才会无条件地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和人人都是高贵的和独特的观念。这是人类自身成熟的标志。如何达到人心的和谐？作者认为，首先需要改变我们以往的思想模式、我们对爱的理解、我们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日常方式、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方式、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的使用方式、我们对现实的知觉方式等等。以爱为例，作者认为，"爱"也同生命一样，具有一种不断发展的本性和潜力，因而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局限的爱到终极的爱的发展过程。最低级的是情欲之爱，这种爱往往是疯狂和短暂的，因为情爱的动力是短暂的性欲冲动；其次是家庭之爱，这种爱也是有局限的，因为其纽带是一种血缘关

系，而血缘关系不是最坚固的；再其次是对国家的爱，这种爱同样是有限的，因为爱自己的国家往往伴随着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憎恨，所以它往往被仇恨抵消。这些爱之所以具有局限性，因为它们以物质纽带连接。最高级的爱是对绝对真理的爱。这种爱的纽带是精神的和永恒的，因而是终极的和完美的。知道了这一点，人们就要一开始选准爱的目标，如果执着于一种有局限的和暂时的目标，我们的爱必然是有局限的和短暂的。反之，我们如果选择的目标是普遍的和富有意义的，我们的爱就是普遍的、永恒的和富有意义的。因此，在爱的领域，人类有着选择的自由，完全可以控制和掌握自己成熟的进程。

作者重点阐述了改进人际关系的战略。他把人际关系区分为三种类型：权威型、沉迷型和综合型。前两种是人类青少年时期特有的形态，后一种是人类成熟期特有的形态。权威型常见于人（或人类）的青少年期。这个时期的人常常感到一种无能为力感和不安全感。为克服这一点，他就把取得权力作为生活的主要目的，成为“向往权力”的人。这种人总想取得一种可以支配他人的地位。当他遇到与他同类型的人时，二者必然产生争斗，造成社会的不安定。由于频繁地与他人冲突，其知觉发生了变化：总是把周围的事物和他人严格地划分为“非好即坏”（或非敌即友、非内即外）的两极。这种性质被称为“两极性知觉”。“权威形态”的第三个性质是“权威服从”，因为向往权力，必然无条件地服从权威。它的第四个性质是“情感和思想的僵化”：因为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对权威的依赖感，所以他的思想和行动从不敢离开权威们定的教条。作者认为，“权威形态”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争斗的基础。沉迷型的人际关系常见于不成熟的少年、青年和不成熟的社会。所谓“沉迷”，是指沉迷于对快乐的追求。当一个人或一个社会中，物质繁荣超过其精神的成熟程度时，快乐就成为单纯的物质享乐，“自由”被曲解为自由地满足人的生物的和物质的需要，其生活则变成无秩序的、疯狂的和糜烂的。这种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当与他人发生关系时，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综合性的人际关系，以人与人之间的爱为导向，具有多样统一性、责任感和创造性等特征。在这种关系中，人总是以爱心对待别人；总是把别人视为独特的、美好的、重要的，拥有与自己相同的权力和机会；人的思想和行动从不依附权威和教条，总是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自己的创造精神，并以一种合作的态度与他人发生关系，所以会造成良好的世界秩序。作者认为，这种成熟的人类关系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科学观和宗教观。

三、《关于公元2000年取得人类和平》（J. Huddleston: *Achieving Peace by the Year 2000*, Bahá'í Studies Publications, 1988.）

J. 胡德莱斯顿在这本书中画出人类和平的近期蓝图。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变刀剑为犁头！”此话准确地传达了本书的意旨所在。按照作者的意见，在本世纪末实现人类和平是完全可能的。实现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软”的，一种是“硬”的。前者指“人类大同”观念的高扬，后者指通过国际性条约和其他外交手段来实现这种观念。作者根据以往的经验提出，只有这两种途径密切配合，和平事业才有保证。仅使用软的手段，不能在短时期内见出效果；而在使用硬的手段时没有软的手段作基础，所取得的任何效果都是短暂的和空洞的。为说明如何实行“软”手段，作者详细分析了以往时代引发战争的因素，如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贫富悬殊、宗教争端、男性主导、武器竞赛等等。作者还指出，西方传统一向认为，当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时，他就是有罪的，只有以耶稣的牺牲来救赎，人类才得到拯救。这一观念得到早期物质主义科学的支持。后者认为，人类来自动物，所以其本性

也同动物一样，是侵略性的。这一观念在法国启蒙主义运动中得到纠正，后者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但是，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又把人性善的观念彻底击碎了。现代人认识到，人的本性要比上述两种早期认识复杂得多。它既有动物性的一面，又有灵性的一面。其动物性的一面如果得到控制和正确引导，就能很好地服务于人类和平。其灵性的一面表现在他可以通过宗教、艺术和人类之爱等，不断达到一种自我超越。如果人类通过自我修养和教育等不断提高灵性的一面，其动物性的一面就能得到全面有效的控制，从而加快和平的进程。在阐述硬的途径时，作者指出，人类和平事业不能满足于理论上的论证，它必须从讨论走向行动。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为和平事业尽力，每个人不仅应该知道为它做些什么，还应该知道怎么做。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和平就越容易实现。紧接着，作者提出了 12 条具体建议：1. 建立全球性和平运动同盟；2. 召开世界和平大会；3. 制定消除国与国之间战争的条款；4. 制定销毁一切攻击性武器的条款；5. 制定一套反侵略的普遍性条款；6. 建立一种新型的世界和平议会；7. 制定对国际争端做出裁决的仲裁条约；8. 建立国际和平部队；9. 建立独立的和平基金；10. 确立男女在和平事业中的平等地位；11. 加强“世界公民”意识，制定一套全球性的和平教育计划；12. 消除一切加剧国家间紧张关系的活动。作者进而列出在 2000 年之前实现上述措施的年表。